

一、引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英雄何处是，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

幅员辽阔的国土是每一位华夏人士引以自豪的骄傲，它为古往今来无数风流人士提供了纵横驰骋、尽情施展的广袤天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也只有植根于如此国度的英雄豪杰才有如此博大浩瀚的胸襟与时光观。每当我们神往于中华古老文明的璀璨与悠久之时，自然不会忽略蕴育这一切的辽阔国土。

慨叹之余，我们不能将对古代中国的回顾仅仅停留在“发思古之幽情”上，这里首先应当澄清的问题就是古代的中国到底有多大，这恐怕是每一位中国人应该具备的常识，也是本书所要介绍的内容，即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众多历史学者的辛勤工作为我们了解历代疆域变迁状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要将此问题透彻地讲清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跨越数千年，其间各个王朝嬗变转换，扑朔

迷离。各个王朝的疆域都不尽相同，变化错综复杂，缺乏规律性，在我们开始接触这一问题之始，会立即感觉疑云丛生，如堕五里雾之中。而拨开这层层迷雾的金钥匙首先是种种概念的辨析。

在进行概念辨析之时，我们心中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各种概念的出现，在其渊源上看，是各个不同时代的产物，由相同文字构成的词汇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具有并不相同的含义。就拿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中国来说，其含义的变化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今天，“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而这一词汇并非我们现代中国人所专有，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古王朝——西周初年就出现了。西周王朝政权构成的突出特点是分封诸侯，即周天子将大部分统治区分成众多的小块，连同上面的百姓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由他们治理管辖。平时称臣纳贡，战时率众随周天子出征。作为诸侯统治区的中心与标志，各种城、邑遍布全国，而这种城邑便是“国”的最初含义。而此时所谓“中国”，即指周天子所居之“国”。时至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地位衰落，通过吞并周边小国而强盛起来的各大诸侯国争雄称霸，而此时的“中国”便不再单指周天子所居城邑，而包括那些地理位置在各诸侯国中心区的国家，即位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的周天子直属区与诸侯国中的晋、郑、宋、鲁、卫等。而地处较为偏远的诸侯国就不能算“中国”。如秦国就因位于“西垂”，被时人称为“不通中国”。

到了秦汉大一统封建集权国家建立后，“中国”的内涵也出现较大地变化。传统意义的“中国”范围依然保留，原来地处中心区的诸侯国已变成统一国家的一部分，这部分“中

国”渐与“中原”意义相通。大一统王朝的正式统治区在同一的行政区划之内，自然同属一国，不可能再有“国”的区别；同时，大一统王朝辖区内，华夏（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而少数部族居住区均在王朝统治区四边，这些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风俗习惯与汉族差异明显，因而被华夏（汉）族人士视为蛮荒、不通王化之区。这样，汉族统一王朝的主要统治区相对于这些“蛮夷之地”而言，均可视之为“中国”。

这样一来，“中国”的内涵变得丰富而复杂。所谓“中”者，自然是与四周比较而言，统一王朝时期“中国”就不仅仅限于政治意义上的对比，而是带有经济、文化方面的标志。由于时代与视野的局限，汉族中央王朝的士人具有非常强烈的优越感，理所当然地自认为是最先进地区的代言人，以“中国”自居，傲然俯视周边“夷狄之人”。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不仅包括汉族中原王朝的主要统治区，而且成为经济、文化最为先进地区的代名词。在这种意义上，与“中国”相通的词汇就有“中土”、“中夏”、“中华”等。

游牧民族的强盛与南迁，尤其是他们在长城以南农业区建立起政权后，给这种“中国”观念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首领们乘机而起，在中国北方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逃亡于江南的汉族士大夫称之为“五胡乱华”。这些一向自视清高，饱读诗书的汉族士人无可奈何地承认传统的“中国”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已落于“夷狄”手中。稍有骨气与血性的人们如祖逖、桓温等便慷慨激昂地从事北伐，力图“恢复中原”。摆在当时人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便是，谁是正宗“中国”的代表？“

胡乱华”的结果是北魏一统北方，建立起强盛的王朝。南方汉族政权并未能团结奋斗，一致“向北”，相反内乱迭起，上演了一幕幕改朝换代的闹剧。在无法正常交流、平等对话的情况下，南北方政权为证明自己为“中国”正统代表展开了唇枪笔战。南方政权称北方王朝为“索虏”（扎头发的下贱人），北方斥南方政权为“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其实南北政权的主要辖地在秦汉统一王朝时，都在当时行政管辖区之内，这场论战的起因大概主要是传统的“中国”观念在作怪。这场名义之争到隋唐时代得到了公正的解决，新的王朝统治者给当时南北双方的平等的地位，都视为“中国”；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南北朝”的名称。由此可见，在人们观念中，“中国”的内涵已经大大扩展了。

但我们应当明确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具备法定意义，并不是历代王朝政权的正式名称。历代王朝均以各个王朝名称自谓或向四外发号施令。如唐朝统治者以“唐”、“大唐”自称，清朝的正式名称为清、大清或大清国。在上古时期，正是这种名号的流播，域外才有了对中国各式各样的称呼，如源于秦的支那（或震旦）、源于拓跋鲜卑的桃花石、源于曾建立辽朝的契丹人的契丹等，尽管这些称号各异，但在域外人心目中，中国只有一个，即 China（旧译作支那），并没有中央之国或中心之国的含义。从晚清开始，中国作为清王朝国家的名称使用于正式外交条约中，而西方人也只是将其视为 China 译名而已，但从“支那”到“中国”译名的不同，是不少中华爱国人士努力的结果，因为只有“中国”这一名称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首肯与认可，其中答案恐怕只能从几千年文明史所形成的传统心态里去寻找。 1912 年中华民国

建立后，中国成为它正式简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仍然承袭了这一名称。

鉴于历史时期“中国”内涵的复杂变迁，我们的讨论必须进行特别的界定，也就是说，我们这本书讨论的“中国”的具体范围是什么？我们既不能局限于历代统一王朝的正式统治区，更不能为传统的“中国”概念所束缚。历代王朝正式统治区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在不断地扩展，到 18、19 世纪清王朝所辖疆域最为广阔。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为准。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丧失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民国时期，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也使中国失去了 156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些地区自然不能排除在历史时期“中国”之外。较妥善的处理即是以清王朝长期统治的最大疆域为准，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历史时期凡是在这一范围内建立的政权及行政区（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政权与聚居地）都是我们讨论的“中国”。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疆域。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在国家关系与国际事务中，使用频繁的法律词汇是领土，即指在一国主权之下的区域，包括一国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领空。疆域作为传统的名词，已基本绝迹于现代正式的条约文件中，而我们进行的讨论是以疆域为题，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番较详细的解释。

疆域与领土在内涵上有很大的重合，两者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水平的差别。所谓疆者，界

限也；域者，面积幅员也。疆域即以界线为标志的一个政权或政体所辖地区的范围。据常理而言，每一个政权都应明确自己的统治区，明确自己的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古代中国。

中国古文献中有一个相当出名的典故——夜郎自大，这一典故反映的正是当时人们对疆域的认识问题。汉朝是中国一代强盛的中原王朝，其统辖疆域之广阔受到后人的敬仰与推崇。但当时在今西南地区有一个夜郎国，其君主对汉朝的情况一无所知，夜郎国的面积恐怕只有汉朝的一个县大，但国君已感到十分自豪。因而在汉朝使者前来访问的时候，夜郎国君便询问道：“汉朝与夜郎比起来，哪一个大？”汉朝使者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件事在汉朝被传为笑谈，也就是“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夜郎国君的无知固然可笑，但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中原人士在嘲笑夜郎国君的时候，是否同样犯着“夜郎自大”的错误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中国有一部古老的诗歌集——《诗经》，又被儒家尊奉为重要经典之一。《诗经》中有一段颇有名的诗句为：“溥（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中国的帝王是君临天下，拥有一切的最高主宰。这恐怕同样是“夜郎自大”式的宣言。在这种观念下，中国帝王的统治区包容天下，广袤无垠，根本没有探讨疆界的必要。这种盲目自大其实是上古时期生产力极度落后，交通与信息极不发达状况所造成的。疆界往往是对立的双方妥协的结果，上古时期人口十分稀少，政权或政体的君主与臣民往往聚居于城池之中，人们武力争执的对象大多以人口聚居的城池为核心，而对郊外及相互间的旷野没有多大兴趣。因此彼此的疆界是

较为模糊的，或者说没有能力或没有必要搞清楚。

《诗经》所云大致反映了中国西周封建领主制社会人们的疆域观念，周王统辖下的诸侯似乎还没有各自为政与分疆裂土的要求，这就造成了王朝与各诸侯封地界线的笼统与含糊，这种状况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了根本的改观。从春秋时期开始，周王地位的衰落，周边“夷狄”之国的强盛，使得中原各诸侯国奋起自强，在激烈的竞争中图存。他们一方面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联合起来反击周围“夷狄之国”的进攻。另一方面力图自己国家的强大。率先强盛的国家便成为“华夏诸国”的盟主，这就出现了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这些国家一般都是当时人口及领土最多的国家。当时各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有较明确的疆土意识，千方百计为扩展自己的领地而努力。当时各主要国家疆域的总和大致就是那时华夏族控制与居留的主要地域。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恐怕就是如何弄清当时众多“戎狄之国”的疆域状况。据很不全面的汉文史籍记载，不少“戎狄之国”不仅在疆域上与华夏诸国犬牙交错，而且拥有强大的武力与较完备的政权机构，忽视对这些小国疆域的研究，其结论是片面和不公允的。

上面我们简单回顾了古代中国人对疆域的认识及上古国家统治范围的复杂变化，可以对领土与疆域之间的差异有一个较深刻的印象。领土作为当代国际法中的重要术语，具有十分严格的界定，当一个政权拥有主权的地域没有经过勘定划界，或与邻国通过条约的方式确定分界线，我们就不能轻易将这一政权拥有的地域称为领土。同时，国家之间边界线确立后，具有永久性和权威性，是不允许轻易改变的，历史

上中国各大王朝的统治区域大多很难达到这一要求。另外，在飞机发明之前，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领空受到别国侵犯。领土还包括一个国家的领海、底床及底土等内容，在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均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和关心。

正由于中国古代缺乏国家间十分严格的勘地分界，所以各个政权往往是通过行政区域的设立来控制自己的疆域。疆域的拥有并不在于名义上主权的取得，而在于实际地控制，行政区划正是一个政权实际控制疆域的最主要标志。先秦时期，行政区划的发展处于草创时代，人们很难明确各个政权疆域的真实状况。秦朝统一后，将郡县制推广至全国，我们通过了解郡县的设置，对秦朝疆域也就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从秦朝至近代，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变化相当复杂，但其与疆域的关系是紧密不可分的。无论是郡县制，还是府州制、行省制，我们判断某一王朝或政权疆域的最重要依据便是其行政区划的实际内容。

然而撇开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不谈，就每个时期来讲，各地区的行政区划的设置并不整齐划一。各种正史《地理志》将各个王朝统辖区域行政区划的类型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进入记载的各类地区并不都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疆域。我们有必要对各种行政区与疆域的对应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历代王朝所辖区域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正式行政区、特殊行政区、军事驻防屯垦区及民族自治区等。

从秦朝开始，正式设置郡、县，或州、道、路、府、行省（包括省与布政司）的地区一般均为王朝或政权的正式行政区，这是各个王朝及政权疆域的基本部分。这些地区都设

有正式分级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负责对管辖区内的人民进行户籍管理，征收赋税及执行法律。王朝及政权拥有正式行政区内的一切权力。在某些特定时期，王朝或政权在边远及新占领地区虽然有了名义上的行政区设置，却有意实行较宽松的管理，如减免赋税与不进行严格的户籍登记，这便是我们所谓的特殊行政区。这些特殊行政区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具有较明显的游离性，王朝统治者只有在时机成熟之后，才将这些地区等同于正式行政区，进行全面的控制。

在中国重要的王朝建置中，有一种较特殊军事驻防区，它们一般都分布在王朝的边疆地区，以特殊的军事机构控制和管理当地人民。这种军事驻防区在西汉以后有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唐代大部分都护府均具有这种性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驻防区还有明代数量众多的卫所以及清朝的将军辖区。对于中央政权而言，这些地区边防意义重大，因而驻扎着大量军队。由于肩负着长期坚守的重任，同时也为了减轻中央政府军需供给的压力，驻防军队大都实行屯垦，也正是由于这种“亦兵亦民”的性质使得驻防区向一般行政区靠近，最明显的表现便是驻防区内的普通民户也由军事长官管理。

在上述几类区域中，民族成份一般较为单纯，而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少数民族问题是相当复杂而棘手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央朝廷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治理方式，这也就相应形成了特别行政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中央政府承认当地世袭的民族首领为官方行政长官，这些首领不仅可以保留原有的名号，拥有自己的武装，而且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如对中央不承担赋税和劳役，中央不直接派遣官员，等等。这

些首领只是必须向朝廷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不经中央同意，不得擅自与外界接触。这些首领的官方称号与其他地方长官的名号是一致的，同属于一个行政区划制度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民族自治区是王朝疆域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中原王朝在上述各类政区之外，往往还有不少属国、藩国、羁縻单位等附属区域，在文献记载中，这些地区的长官都直接或遣使节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实际上这些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很难一概而论，这也是中国历代疆域的阐释中最令人头痛的部分，自然也就成为讨论的重点内容。

我们在文献中看到某某国使节入朝“进贡”，千万不能认为此国与中原王朝有政治上的君臣隶属关系，此国领地是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习惯于以为“居天下之中”、“为天下之主”的观念，尤其在大一统王朝时期，并没有国与国之间平等外交的认识，于是总是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对待一切前来接洽的使者，这当然是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的表现。就距中原王朝中心区远近而言，记载中前来“称臣纳贡”的外国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距离辽远、纯粹以通商贸易为目的的国家，它们与中原王朝或政权没有丝毫疆界上的关联。这些国家的使者与商人有时自愿地向中原王朝的帝王称臣纳贡，主要是为了得到贸易上的利益与合法的保护。这在中国历史上强盛王朝中表现尤为突出，众多的外国商人来到中国，通过“进贡”等方式讨好王朝统治者，甚至得到大量赏赐及免税特权。这种交往并不涉及到国家间的主权与归属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中原王朝的臣子将以平等身份前来的外交代表硬说成“朝贡”，这种“正大

光明”的歪曲突出地表现在清朝与近代西方国家的交往之中。尽管西方国家的使者强烈反对清朝上下妄自尊大的歧视态度，但在中国文件中都将这些外国使节的来访称之为“进贡”等。对于这些怪现象，我们自然应有清醒的认识。

记载中另一类“称臣纳贡”的政权在中原王朝周边，与中原王朝正式行政区接壤，它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从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演变过程看，大致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起先相当独立的政权通过“称臣纳贡”以及中原王朝长期的交往后，逐渐失去独立性或在内政紊乱之时自愿归依于中原王朝的保护与管理之下，直至此时，这些政权的辖地才与中原政权的疆域连接在一起。历史上中国北方各游牧民族政权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小国虽然有长期“纳贡称臣”的经历，甚至被强盛的中原王朝强行划入同一的行政区划内，却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性，我们必须注意不同时期中原王朝与这类政权关系的实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算朝鲜了。早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就在朝鲜半岛设置了玄菟等四郡，至唐朝，中原王朝又多次出重兵攻打高丽等国，但朝鲜半岛诸国保持着顽强的独立性。到明清时期，朝鲜虽仍向中原纳贡称臣，但其内政并不受中国的干涉，其辖地自然也与中国疆域无关。因此，我们在判断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之时，首先要摆脱狭隘的封建正统观念，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进行分析。

上面我们主要讨论了行政区划制度与疆域变迁的关系。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变迁是异常复杂的，然而正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一样，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有着相同独特的轨迹，它不仅表现在面积的广大，而且更在于疆

域异乎寻常的稳定。世界历史上曾有许多光耀一时的文明古国，也有不少震撼今古的强大帝国，但在一阵炫人耳目的绚烂后，这些国家在一片片瓦砾和废墟中结束了喧嚣，失去了踪影。唯有中国，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后，神州规模初就，后虽历经沧桑，遭遇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愈来愈兴盛，万里河山最终归入一统的版图，这的确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历代风云莫测的改朝换代中，中国的基本疆域（即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农业区）始终是中央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当回顾中国历代疆域变迁之时，我们不得不对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光辉成就深表敬意，为能身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而感到无比自豪。可以说，了解中国历代王朝疆域变迁的历史，就是了解中华民族的祖先光辉创业史。

二、草莽榛榛筑造古国

——先秦时期疆域变迁

在对一些基本概念和问题进行扼要分析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介绍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状况了。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土地上，至少在几十万年前已有人类生活、繁衍，但在原始蛮荒时代，是谈不上疆域问题的。从最基本的内涵上讲，疆域是一个政权控制拥有的区域，因此，疆域的产生取决于政权的出现。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事迹，因年代过于久远而无从考稽，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较统一的部落联盟，联盟的最后一位杰出的首领便是著名的治水英雄——禹。禹死后，其子启夺取了部落首领之位，并开创了由一姓世袭的君主制国家，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夏朝之名源于其主要民族的称谓，我们判定夏族及夏王朝统治的大体区域的主要根据便是文献记载中夏朝君主曾经居住的都城。上古时代，人们抵御自然灾害与外来侵袭的能力很差，于是当时人们就采取不断迁移的方式进行躲避与自我保护，王朝都城迁移的位置往往就成为当时政权迁移活动最重要的坐标。夏朝君主居住过的都城有阳城（今河南登封

市东南告城镇)、斟(今河南巩义市旧巩县西南)、阳翟(今河南禹州市)、老丘(今河南开封市东北)、帝丘(今河南濮阳市)、西河(今河南安阳市东南)、原(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等地。据此可知,夏王朝控制的区域大致集中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

根据文献记载勾勒出来的这一范围已经为考古发掘成果所证明。长期以来,夏王朝的有无曾经是困扰考古学界的一大难题。随着新的考古文物与遗址的发现以及艰苦的论证,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以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夏文化遗存,其中 1960 年在距偃师市西南洛阳老城东约 18 公里处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被考古学者定为夏王朝都城所在地之一。又据文献资料,夏王朝下辖许多方国,如有莘、有虞、有扈、过、寒等。正是这些小方国的领地联合组成了夏王朝的疆域。

当时在夏族活动区周围活跃着不少其他民族,夏族正是在与这些民族的争斗中维护和拓展着自己的疆土,其中东面的夷族对夏王朝的生存威胁最大。夷族最著名的首领是传说有“射日”壮举的传奇英雄后羿,这位举世无双的英雄率领部众曾经战胜了夏朝的国君,成为新一代的统治者。应该说,至此夏朝的疆域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因为夷族的活动区也归入了夏朝统治区。至少康与杼(他们同为夏后的后裔)之时,夏族势力又重新崛起,再次夺回国君之位,史称“中兴”。

夏朝最后一位国君桀是出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使各小

方国怨声载道，奋起反抗，后来强大的商族在首领成汤领导下，攻灭夏朝，为其 400 余年的历史划上了句号。据载夏桀被放逐到南巢（今安徽巢湖市东北），这大概是夏朝最大疆域的边缘了。

商朝创立于公元前 16 世纪，其统治民族为商族。商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居留中心地频繁迁移。商朝建立后，其国都又多次迁移。当我们同样根据这些都城位置确定商朝统治区范围时，会明显发现，商朝疆域比夏朝有较大的扩展。商朝的国都依次有亳（今河南商丘市北）、囂（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邢（今河北邢台市）、庇（今山东鄆城县北）、奄（今山东曲阜市）。文载记载中商朝都城最困难又是最出名的一次迁移是盘庚在位时由奄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市），即所谓“盘庚迁都”。自此以后，商一直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因而商朝又有一个别名——殷。

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国力趋于强盛，四处征伐的胜利使得疆域得到更大的拓展。武丁在位时南征荆蛮，这就使商朝疆界从黄河中下游南推至长江流域。然而商朝统治者长期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衰弱，境内民不聊生。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耽于女色，不惜民力，大失民心。国内各诸侯在西方周族首领周武王的领导下，联合讨纣，商朝军队也在阵前倒戈，商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代商而起的周朝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的一个重要朝代。周族的始祖名弃，又号后稷，姬姓，相传是种植稷和麦的第一人。在周族早期发展史上，也有四处迁移的记录。时至商朝，周族随首领古公亶父迁徙至今陕西岐山下的周原，定居下来，子孙繁衍，力量日趋强盛，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

强族。然而周族真正地威震四方，还要归功于两位声名显赫的首领，这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

周文王名姬昌，时称“西伯”，在中国古代史上被传颂为睿智仁厚的贤明君主。在他的治理下，周族聚居区和睦平静，道不拾遗，从而赢得了众多诸侯及百姓的尊崇。商纣王十分嫉恨，曾将文王拘禁于羑里监狱。我们在文献中却发现，植根于西部的周族在周文王的领导下，不断向东扩张，事实上对商王朝构成了威慑。如周文王攻灭黎（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崇（今河南嵩县北）等国，并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市沔水西）。其子姬发（即周武王）继承了父亲的遗业，终于联合诸侯，一举灭商，建立起新王朝，史称西周。武王在沔水东建立新都，即为有名的镐京。

周朝疆域比起夏、商两朝来，进一步扩大，这就给地方治理与政权稳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初兴的周王朝曾在这方面有过惨重的教训。起初，周武王为了安抚商朝遗族，将商纣之子武庚封于殷为侯，派遣己弟管叔鲜、蔡叔度作为监理人。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纪太小，无法主持朝政，其叔周公旦承武王遗命，执掌朝中大权。这引起管、蔡二人的强烈不满。早有谋反之意的武庚乘机与管、蔡二人联合，率商朝遗族与东方夷族发动叛乱。这场叛乱震动了朝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最终取得全胜。为了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着手在洛水之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起建新都，是为“成周”，人们习惯称镐京为“宗周”，两处都城便成为周朝两个政治军事中心，新都的建造对周王朝疆域的稳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王朝在广阔的统治区内采取“众建诸侯”的形式进行

治理，即将同姓宗亲与异姓功臣分封于各地为诸侯，诸侯的封邑便形成大大小小的国邑，这些封国拥有自己的都城、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只是定期到周都城朝贡，受到征召后随周王出征。这些封邑成为周朝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对西周疆域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对当时一些重要封国的方位作出简明的介绍。据文载记载，西周时期较重要的封国有：

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

丰（今山东青州市西北）

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邲（今河南汤阴县东南）

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北）

卫（都沫，今河南淇县）

晋（都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

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

蔡（今河南上蔡县）

楚（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南）

徐（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吴（都蕃离，今江苏无锡市东南）

这些封国散布于各地，各国君主实际控制的区域常常局限于本国都域周围不大的范围，这样客观上就形成了国与国之间大片的“隙地”，这类隙地的存在一方面表明当时各封国之间界限的模糊，另一方面为其他民族提供了充裕的活动空间，即在各封国周围活跃着不少“戎狄”部众。从商朝开始，王朝周边“戎狄”的种类和数量都有增加的趋势，如燕京戎、条戎、犬戎、淮夷、西落鬼戎、肃慎、翟、羌及巴、蜀、越